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研究述评^{*}

魏丹，许培源

(华侨大学，福建泉州 362021)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吸引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主要沿着三个研究方向进行：(1) 基于国际贸易视角，以 Viner 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基础研究直接投资区位的静态效应。(2)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反应策略和投资区位的影响；或者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事前模拟和预测投资区位效应的程度和方向。(3) 以新经济地理学资本流动模型为基础，从微观机制阐释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的投资生产区位空间集聚演化与分布。三个学科方向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在未来，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量化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投资区位的影响程度，以及应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微观内生的动力机制层面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国际贸易视角；产业组织视角；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①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尽管二战前欧洲一些国家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但战后一段时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快速发展。Balassa (1961) 认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要素是贸易和投资。然而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才对投资区位效应^②有了浓厚的兴趣（Ethier, 1998a）。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实践无疑是欧盟，部分文献已验证或者表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不仅促使大量区域外跨国公司来区域内投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直接投资的增加，在欧洲内部形成了强大的投资区位效应（Baldwin et al., 1995）。

近年来，由于 WTO 谈判屡屡受挫，各国努力达成多边框架下投资协定也未见成效，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双边或区域性安排来推动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积极部署以其为中心的一体化贸易与投资格

局，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旦 TPP 和 TTIP 达成，那么随着区域内部贸易壁垒的降低或消除，区域内的跨国公司必将利用新的投资区位优势调整其生产布局与投资方向，从而会带来新的分工格局，亚太乃至世界各国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的研究再次引起国际经济学者的关注（金中夏和李良松，2014）；（Nguyen 和 Sgro, 2014）。

本文从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三个视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其优势与不足，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际贸易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传统研究

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时期（1958 年），国际经济学者主要关注区域经

作者简介：魏丹（1981-），女，辽宁锦州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亚太经济研究；许培源（1970-），男，福建安溪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亚太经济研究。

* 基金项目：2015 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静博士论文项目“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 TPP 亚太国家的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FJ2015C223），负责人：魏丹。

① 本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指独立的经济体通过签署一体化协议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这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同义语。正如 Krugman 所说，国际经济学的一大部分是区域经济学的一小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 Ohlin 在其著作《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中也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国际贸易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

② 区别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效应（即投资创造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的静态研究，本研究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生产选择和投资区位空间分布的动态影响，故采用投资区位效应的概念。另外，本文所谈及的投资主要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济一体化的国际贸易效应。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 Viner 在完全竞争框架下,首次提出关税同盟会导致“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后, Balassa (1967)、Wylie (1995) 等在 Viner 的分析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拓展,但这些文献都没有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彼得和罗布森,2001)。究其原因,一方面, Hymer (1976) 首次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远没有像国际贸易理论那样的成熟,尚处于建构和形成时期。另一方面,当时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尚未充分显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因此未能引起国际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

1966年, Kindleberger (1966) 基于 Viner 的研究框架,首次提出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理论,从而奠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研究框架。Kindleberger 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流向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所引起的,由于区域内自由贸易导致贸易由低成本的外部国家转到区域内成员国,外部国家的厂商为了取得因贸易转移失去的市场而转向到区域内生产,区域内直接投资流入增加。投资转移是对贸易创造的反映,当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导致贸易创造时,一些成员国的区域内直接投资将上升,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以及区域外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停滞不前,故理论上也没有新的突破。

从国际贸易视角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存在以下不足:

(1) 假定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基于 Viner 研究框架的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假定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因而无法捕捉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效应(Scoppola, 2006)。

(2) 忽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企业生产区位和所有权的影响。基于 Viner 研究框架的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并未考虑企业的跨国投资特性,因此,未能将跨国公司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研究,从而忽视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企业生产区位和所有权的影响(Panagariya, 2000; Krishna, 2008)。

(3) 忽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尽管 Kindleberger 的二分法区分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但他仅仅是简单地提出了概念,并没有抓住区域一

体化形成与投资区位生产选择的全部复杂问题^③。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内直接投资流入的动态影响(动态效应)更明显,它通过影响生产的市场竞争、规模经济、技术扩散等因素来改变成员国的市场结构,使区域内部更具吸引力,促进厂商在更具效率的市场上寻求投资机会,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彼得和罗布森,2001)。

二、产业组织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生产选择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跨国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欧盟、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等)也日趋盛行,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思想开始植入贸易领域,结合跨国公司的投机动机和反应策略等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逐渐占据主流。

(一) 结合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

Dunning (1988)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LI理论)认为只有“企业无形资产所体现的特定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内部化优势”三者同时具备时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彼得和罗布森(2001)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一方面改变了区域内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优势,引起区域内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改变了区域内成员国间的相对竞争,从而影响外来直接投资在区内的生产布局以及成员国间相互直接投资的流向。

Yannopoulos (1990)、UNCTC (1990) 和 Dunning (1992) 在 Kindleberger 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结合国际生产理论对产业组织的分析,指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将决定它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反应程度,从而带来区域内国际分工、生产体系重组、投资流动等投资区位效应。他们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投资动机:(1) 防御性进口替代投资又叫桥头堡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在区域内保持其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转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2) 攻击性出口替代投资,即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利用区域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性投资;(3) 重组投资,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创造效应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它促使跨国公司根据竞争优势重新组织投资活动;(4) 合理化投资,即针对生产成本的国际差异进行投资。可

^③ 比如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每一个动态及静态影响与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国内外的投资策略联系起来(彼得和罗布森,2001)。

见,防御性进口替代投资和攻击性出口替代投资主要以代替贸易为动机,从而产生有利于区域内的投资区位效应。而重组投资和理性投资则以促进贸易为动机,从而影响区域内成员国间的投资区位分布。

Yannopoulos 等人利用国际生产分析法对投资动机的分类研究有助于解释复杂的跨国投资现实,但他们对直接投资影响的事前预测和事后实证研究,以及对投资收益的评估等是否有价值仍有疑问 (Rugman 和 Verbeke, 1990)。另外,这些研究强调了跨国公司的组织特性,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如何左右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而对它所带来的投资区位效应的研究显得不足。

(二) 结合跨国公司反应策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通过消除成员国间的政策壁垒,促进成员国间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甚至通过对非成员国设置贸易壁垒来吸引直接投资^④。跨国公司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作出出口贸易还是直接投资的不同反应,进而改变原有的直接投资区位和生产布局。

Motta 和 Norman (1996) 首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利用寡头垄断厂商的局部均衡博弈模型,发现降低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将促进区外跨国公司对区内国家直接投资 (即出口平台型 FDI)。随后,Neary (2002) 模型化了 Yannopoulos (1990) 等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分析,指出区内国家 FDI 流入的增加与区外厂商的逃避关税型投资、出口平台型投资有关,从而对不同类型投资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Ekholm et al. (2007) 则在南北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将第三国出口平台投资^⑤引入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模型,认为南北一体化促使区域外厂商选择第三方出口平台投资,而区域内北方国家选择垂直型或全球出口平台投资。

然而, Motta 和 Norman (1996)、Ekholm et al. (2007) 等学者的研究仅适用线性需求以及跨国公司无差异的情况。与此不同,Nguyen 和 Sgro (2014) 提出了一般需求结构和跨国企业非对称性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跨国公司出口平台 FDI 的理论模型,模型不仅清晰描绘了 Motta 和 Norman (1996)、Ekholm et al. (2007) 的研究结果,同时也考虑了区域经济一

体化下东道国政策对跨国公司出口平台 FDI 的影响,认为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东道国优越的投资环境 (包括引资政策) 会鼓励出口平台型 FDI。Ito (2013) 也曾做过类似的研究,但他在解释出口平台 FDI 时更多的是应用实际数据,在理论上的贡献不多。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进行“事后”评估与分析。Blomstrom 和 Kokko (1997) 实证分析北北型 (加拿大 - CUS-FTA)、南北型 (墨西哥 - NAFTA) 和南南型 (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果表明成员国内自由化程度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会促使流入的 FDI 增加。Blomström 和 Globerman (1998) 则对比形成初期的 EU 与 FDI 之间的关系以及北美 CUSTA 双边协定、NAFTA 三边协定与 FDI 的关系,发现后者对 FDI 的影响更为温和。然而,他们的实证分析并未考虑 FDI 的空间依赖关系,为弥补这一不足,Blonigen et al. (2007) 采用美国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 FDI 的空间依赖关系,发现空间因素的融入使传统的 FDI 决定因素更加稳健。Tekin - Koru 和 Waldkirch (2010) 在 Ekholm et al. (2007) 的基础上,通过考虑一个三国模型 (两个北方国家和一个南方国家),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在南北自由贸易区 (以 NAFTA 为例) 框架下,南北方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区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NAFTA 伙伴国会增加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而其他国家并不明显。邱立成等 (2009) 从跨国公司的投机动机出发,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及成员国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Nguyen 和 Sgro (2014) 利用东盟 7 国 (即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1994 - 2011 年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他们的理论分析结论,即区内贸易自由化以及东道国投资环境越好,流入区内国家的出口平台型投资越多。

总体上,结合跨国公司反应策略的研究侧重于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如何导致跨国公司选择出口平台型 FDI。相对于以往学者着重理论分析,这些文献采用了具体的模型测量投资区位效应的大小,因而显得更具说服力,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建立在局部均衡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已有一体化组织成立的经验

^④ 早在 1957 年 Mundell 就提出贸易政策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即它们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之后,人们开始在局部均衡博弈理论上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如 Smith (1987)、Horstmann 和 Markusen (1992)、Motta (1992) 等。虽然他们有关跨国公司博弈的理论模型都是两国模型,未能很好的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模型设定为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奠定了基础。

^⑤ 即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投资,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第三国。

验证,且未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区位的影响程度、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纳入其中。

(三) 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研究

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跨国公司投资区位效应并不是很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文献着重从理论上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如 Baldwin et al. (1995) 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认为欧盟单一市场计划可能导致欧盟各成员国间产生投资创造效应,导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产生投资转移效应。Ethier (1998b) 采用了与 Viner 的旧区域主义^⑥理论不同的思路,着重分析了新区域主义特点,并提出了包含新区域主义、直接投资、贸易政策等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发达国家并不对发展中小国作出贸易让步的情况下,发展中小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多数是由于其国内政策改革的驱动以及希望通过 FDI 获得收益,而且当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越低时,发展中国家通过 FDI 获得的收益越多。然而 Ethier (1998b) 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和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与现实仍有差距。另外, Ludema (2002) 采用了不同于 Ethier (1998b) 的分析思路,将不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思想与重复博弈的思想相结合,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水平型跨国企业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认为运输成本的降低会刺激关税下降和一体化组织合作升温,从而影响不同国家 FDI 的形式。国内学者东艳 (2009) 考虑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区位效应的影响,分析了吸收区内、区位投资方面,市场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不同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有何不同,进而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深度、成员国间的距离、市场规模及区内与区外国家的生产成本差异等因素将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引资效果”的结论。

另一类文献着重模拟和预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的影响程度。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是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应用较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政策定量分析具有良好效果。Siriwardana (2007), Tsigas 和 Wang (2010), Petri et al. (2014) 应用标准的 GTAP 模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但是,标准的 GTAP 模型只能处理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而不能处理资本跨区域的移动,难于有效地分析政策等因素的变动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影响效果。动态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Dynamic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 Dyn) 克服了上述不足,它包括了跨国资本流动、资本积累,以及投资的适应性预期。因此,采用 GTAP - Dyn 模型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Lakatos 和 Walmsley (2012) 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着重讨论了贸易关税壁垒的降低对东盟 - 中国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的影响。国内学者赵立斌 (2013) 利用 GTAP - Dyn 模型对东盟国家签署不同层次一体化协定的福利影响、贸易规模以及部门产出等生产网络效应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发现区域一体化协定有利于促进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形成。黄凌云等 (2015) 注意到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效预测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综合效应的优势,并模拟分析了日本 - 欧盟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及不同产业的双边贸易的影响。

(四) 研究优势与不足

综合产业组织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的相关研究,发现:

1. 国际生产分析方法忽视实证分析、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研究。它强调跨国公司的组织特性,克服了国际贸易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研究中因完全竞争假定所带来的不足。利用国际生产分析法对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分类研究有助于了解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现实,但对直接投资影响的事前预测和事后实证研究,以及对投资收益的评估等是否有价值仍有疑问。除此之外,它更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研究。

2. 跨国公司局部均衡博弈模型多用于事后验证分析、缺乏对投资区位的动态模拟和预测。结合跨国公司反应策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的相关文献,很好的阐释了出口平台型 FDI 的存在及其对区内区外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然而此类分析并未摆脱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且多用于事后验证,事前预测能力并不强。同时,它尚未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区位的影响程度、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很好的纳入其中。

3. 一般均衡模型的预测能力显著。动态 GTAP - Dyn 模型考虑了跨国资本流动、资本积累,以及投资的适应性预期,在系统量化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三、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研究

上述基于国际贸易视角、产业组织视角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的文献忽视了规模经济、

^⑥ Ethier (1998b) 认为 Viner 理论属于旧区域主义。

本地市场效应对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区位空间分布动态演化的影响,也未能从微观动力机制层面解释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由Krugman(1991a,1991b)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⑦把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在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生产区位集中的内在机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Baldwin et al.,2003)。下面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该类文献进行归纳和评述。

(一)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理论研究

Baldwin和Venables(1995)^⑧首先采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随后Puga和Venables(1997、1998)将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和中间产品引入模型,对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投资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由于这三篇文章采用统一假定,而且在逻辑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Scoppola(2006)称其为BPV(Baldwin-Puga-Venables)模型。然而由于该模型仅使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无法很好的处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效应的接驳问题。Baldwin et al.(2003)考虑了资本可自由流动的情况,先后提出了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和多国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从而使资本流动具有国际直接投资意义,成为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的最佳模型。

1. 基于自由资本模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

1995年,Martin和Rogers(1995)提出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简称FC模型),假定生产要素除了劳动以外,还包括资本^⑨,且资本可以在其所在地以外的其它地区使用,但由于资本所有者不流动,资本收益完全消费在资本所有者所在的地方。标准FC模型中不存在“垂直关联”效应,因此,生产集聚完全由市场准入优势效应驱动。正因为如此,自由资本模型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够处理区域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等外生性非对称问题。

标准的FC模型只涉及两个国家,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问题稍显不足。Baldwin et al.

(2003)将其推广到多个国家,提出多国自由资本模型(MFC模型)。MFC模型承袭了标准FC模型的衣钵,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导致生产转移效应(企业从一体化外部流向内部),这进一步引起了资本内流(投资转移)。生产转移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随着一体化规模的减少而提高。同时MFC模型识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个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即当很多国家达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后,第一层次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得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所有成员收益。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第二层次的本地市场效应,即内部本地市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它会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市场规模最大的成员受益。理论上,若一体化组织内部所有成员间的贸易壁垒完全消除的话,区内的所有产业将聚集于区内的市场份额最大的成员国。

MFC模型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的思路。Coulibaly(2006)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三国两部门模型以反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巧妙的利用贸易自由度变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Kikuchi(2008)基于三国FC模型分析贸易成本的降低如何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和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企业的区位选择会放大轮轴国的区位优势;中心地区吸引外围地区的资本主要归因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这也造成了贸易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进口交易成本,但也会引起资本外流和一些地区交易成本的上升。

国内学者应用自由资本模型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也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多数学者集中于对自由资本模型的拓展。如邓炜(2008)着重分析轮轴-辐条型FTA的国际产业区位效应。通过对比“中心-外围”模型与自由资本模型在分析国际产业区位决定机制方面的差别,他认为自由资本模型更具有可操作性。然后,以该模型为基础构造轮轴-辐条型FTA,对其区位效应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指出轮轴-辐条型FTA具有生产转移效应和轮轴效应(即双层区位效应)。另外,李荣林(2008)在分析各国产业区位影响时,着重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指出当非成员国的劳

^⑦ “新经济地理学”有两个不同理解:一是经济学中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地理在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的新经济地理学。本文主要是指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颜银根和安虎森,2013)。第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是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CP Model),在CP模型中假定只有唯一的劳动要素,在这一假定下,生产的转移意味着劳动力的迁徙,因此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上难免有些牵强,CP模型更适合用于分析一国内部区域经济现象或者一体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国际经济问题。

^⑧ Baldwin et al.(2003)首次把贸易协定对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称为“区位效应”。

^⑨ 这是FC模型与Krugman的CP模型的最大不同,同时这一假设也使FC模型更适合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

动生产率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区内产业会向区外流动,而不是从非成员国流向 RTA 内部。陈丽丽和余川(2011)吸收了李荣林(2008)考虑生产率差异的做法,进一步分析了差异化收入条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直接投资流向、流量的影响,并分别就 Baldwin(2003)两个层次的投资转移效应进行了分析。鲁晓东和李荣林(2009)还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现实,通过构建带有区域化特征的四国八地区的自由资本模型,模拟分析了南北型、北北型以及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规模、流动方向、区位分布的差异化影响。

2. 基于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研究区位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

标准的 FC 模型假定资本所有者不能自由流动,并且资本收益遣返(即生产的转移并不能导致支出转移),因此在 FC 模型中并不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即前向联系-成本关联联系、后向联系-需求关联联系),从而也没有由此导致的生产的突发聚集,因此无法说明自由贸易区内部产生的空间分布突变现象。Robert-Nicoud(2002)将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引入 FC 模型,提出了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 Linkages Model,简称 FCVL 模型)。由于 FCVL 模型把资本的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起来,本质上说是 FC 模型的一个拓展。虽然 FCVL 模型因加入了循环累积效应,引入了突发聚集,有助于分析自由贸易区内部生产区位突变问题,但由于该模型并不能给出产业的空间分布以及收益的显性值,因此,使得该模型的经济政策分析更为复杂。

同样,Baldwin et al.(2003)将 FCVL 模型推广到多个国家,发现,当很多国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结成联盟时,优惠贸易安排同样导致两个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促使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也使得贸易区外部国家的产业向贸易区内部国家转移,而垂直联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并且,源于垂直联系的循环累积因果链使得产业向 FTA 内的某个国家聚集。Christiansen(2010)在尝试解释从北欧国家到波罗的海国家制造业再定位问题时,利用 FCVL 模型与 FC 模型进行模拟,并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成功预测了工业重新定位的方向,同时强化了聚集的含义。Boonyanate(2013)构建了三国 FCVL 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可能影响,认为消除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关税总是会吸引非成员国的投资,但是提高对非成员国的关税并不是维持区域内非成员国投资的有效政策。

尽管 FCVL 模型丰富了 FC 模型的研究结论,但

它只是放大了 FC 模型的效应,而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进,同时,应用 FCVL 模型反而复杂化了产业布局分析和福利分析。因此,其应用前景远没有 FC 模型广阔(鲁晓东和李荣林,2009)。

(二)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对于以上新经济地理学从理论上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区位空间分布的影响,在经验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拓展。但多见于国外学者采用引力模型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 FDI 流量的影响。如 Volpe Martincus(2004)将 Martin 和 Rogers(1995)和 Baldwin et al.(2003)自由资本模型拓展为两国三地区的情况,实证分析了经济一体化和财政竞争对工业品市场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认为越是接近国外市场、国内基础设施越好、财政资助越多的地区,其工业品市场份额也越多。Tayebi 和 Hortamani(2007)研究了区域经济贸易集团 EU 和 ASEAN+3 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FDI 流量,同时也指出了对 FDI 创造和转移起了多大的作用。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将空间因素融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中进行研究。如 Escobar Gamboa(2013)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墨西哥 1994-2004 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结果表明: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低的犯罪率是吸引 FDI 的重要因素;流回本国的 FDI(inbound FDI)与流入邻国的 FDI(inward FDI)具有互补性。An(2013)应用了空间经济理论并采用 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对 CAFTA 的工业集聚和平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小国先发模式的 CAFTA 改变了中心-边缘传统模式负效应,使区域内产业发展相对平衡,CAFTA 组建模式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Boonyanate(2013)利用 FCVL 模型对 CU 和 FTA 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工业区位选择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指出国家间垂直联系水平的提高,在使区域内国家获益的同时也会提高区域外国家的福利,但会造成非成员国福利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 Boonyanate 的研究中发现,低效率国家组成一体化组织会导致企业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间均匀分布,所有国家的福利会降低。而高效率和低效率国家形成的一体化组织则不仅使成员国获益,而且也会惠及非成员国。Wang 和 Chen(2013)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讨论 FTA 成员在不同市场规模情况下的工业集聚效应。他们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验证:FTA 的国际生产转移效应总是正的,并与区域、全球开放度呈正比,而与世界的消费份额支出负相关;成员国间的生产扩张是不平衡的,投资转移效应偏好于支出份额更大的国家。

（三）研究优势与不足

综合上述，应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空间分布存在以下优势和不足。

1. 基于微观动力机制阐释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集聚现象和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发端于国际贸易理论，借鉴了传统区位理论的思想，成为唯一通过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市场机制解释经济集聚的一般均衡框架。新经济地理 FC/FCVL 模型仅假定资本可区域自由流动，完全可以把模型中产业的跨区域分布理解为产业的跨国界分布，从而能清晰地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区位的空间分布。因此，其更适用于分析国家（区域）之间初始状态不对称和资本可跨国流动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

2. FC 模型可操作性强，但会失去一些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特点。FC 模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区域不对称^⑩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模型的均衡解。因此，可以更加明确的给出政策建议。然而由于假定资本收益遣返，因此，FC 模型不存在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丧失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特点。

3. FCVL 模型可操作性差，使得政策分析更加复杂。尽管 FCVL 模型把资本的流动性和垂直联系起来，弥补了 FC 模型缺失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足，但从本质上说它是 FC 模型的一个拓展，只是放大了 FC 模型的效应。相反，由于 FCVL 模型不能得到产业空间分布的显性解，因此，采用该模型会使得产业布局分析和福利分析更加复杂。

四、总结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不断发展，以更好的解释与预测当前 FTAs “第二代”贸易政策，尤其是投资政策的重大影响与作用。本文梳理了从国际贸易视角、产业组织视角和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和对比，发现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主要包括：

第一，理论研究上，虽然产业组织视角下结合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反应策略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的文献，克服了国际贸易视角下市场结构完全竞争的不合理假定，但其主要局限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何种情况下会选择出口平台型投资等，且其采用国际生产分析法研究直接投资区位效应、评估投资收益的方法仍遭受质疑，多数研究也无法脱离局部均衡博弈框架。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的实证研究多数集中于局部均衡框架下的事后检验，缺乏对其所带来的影响程度的预测分析及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分析。

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多样的复杂现实，研究并预测一体化组织将带来的影响，对于世界各国（地区）及时采取相应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完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模拟和预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的影响分析，应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微观内生的动力机制层面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Balassa B. Toward a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J]. *Kyklos*, 1961, 14(1): 1-17.
- [2] Ethier W J. Regionalism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1214-1245.
- [3] Baldwin R E, Forslid R, Haaland J. Investment creation and investment diversio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single market programme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5.
- [4] 金中夏, 李良松. TPP 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4, (12): 3-14.
- [5] Nguyen X, Sgro P. Reg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xport platform FDI: Theory and Evidence [EB]. http://business.curtin.edu.au/local/docs/25_NGUYEN_X_Regional_export_platform_FDI_Theory_and_evidence.pdf. 2014.
- [6] Viner J.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M]. New York: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 [7] Balassa B.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7: 1-21.
- [8] Wylie P J. Partial equilibrium estimate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due to NAFTA [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95, 6(1): 65-84.
- [9] 彼得·罗布森. 国际一体化经济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10] 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76.

^⑩ 包括市场规模不对称，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不对称等。

- [11] Kindleberger C P.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J].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66, 1(1): 65 – 73.
- [12] Scoppola M.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location: what theories (do not) tell u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6, 1556: 117.
- [13] Panagariya A. Preferential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nd new developmen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0: 287 – 331.
- [14] Krishna P.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M].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Volume Ii*. 2008.
- [15] Dunning J H.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88, 3(1): 21 – 66.
- [16] Yannopoulos G 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90, 28(3): 235 – 259.
- [17] UNCT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1990s: Europe 1992, North Americ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ign Government Document]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0.
- [18] Dunning J.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Wokingham [etc]: Addison – Welsley, 1992.
- [19] Rugman A M, Verbeke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Canada – US free trade agreement [J]. *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0: 253 – 266.
- [20] Mundell R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321 – 335.
- [21] Smith A. Strategic invest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polic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7, 31(1): 89 – 96.
- [22] Horstmann I J, Markusen J R. Endogenous market structur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atura facit saltum)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32(1): 109 – 129.
- [23] Motta M.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ariff – jumping argument: 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with some unconventional conclusion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8): 1557 – 1571.
- [24] Motta M, Norman G.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u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 757 – 783.
- [25] Neary J P.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single market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2, 70(3): 291 – 314.
- [26] Ekholm K, Forslid R, Markusen J R. Export – plat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4): 776 – 795.
- [27] Ito T. Export – plat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J]. *The World Economy*, 2013, 36(5): 563 – 581.
- [28] Blomstrom M, Kokko 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6019, 1997.
- [29] Blomström M, Globerman 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 [M].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 1998.
- [30] Blonigen B A, Davies R B, Waddell G R, et al. FDI in space: spatial autoregressive relationship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5): 1303 – 1325.
- [31] Tekin – Koru A, Waldkirch A. North – south integ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18(4): 696 – 713.
- [32] 邱立成, 马如静, 唐雪松. 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研究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01): 1 – 9.
- [33] Ethier W J. The new regionalism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449): 1149 – 1161.
- [34] Ludema R D. Increasing returns, multinationals and geography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6(2): 329 – 358.
- [35] 东艳. 深度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J]. *经济学(季刊)*, 2009, (02): 397 – 426.
- [36] Siriwardana M. The Australia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 economic evaluation [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7, 18(1): 117 – 133.
- [37] Tsigas M, Wang Z.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 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J].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Resource ,2010 ,(3357) .

[38]Petri P A ,Plummer M G ,Zhai F. The effects of a China - Us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 In C. F. Bergsten ,G. C. Hufbauer ,& S. Miner (Eds.) ,Bridging the Pacific: 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39]Lakatos C ,Walmsley T. Investment creation and diversion effects of the Asean -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2 ,29(3) : 766 - 779.

[40]赵立斌. 东盟区域一体化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基于 GTAP - Dyn 模型的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09) : 55 - 67.

[41]黄凌云,王丽华,刘姝. 日本 - 欧盟 epa 对中国、日本、欧盟的影响研究——基于 GTAP - Dyn 的一般均衡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01) : 102 - 111 + 129.

[42]Krugman P. Is bilateralism bad? " , in E. Helpman , A. Razin (Eds.)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 [M]. Mit Press. 1991.

[43]Krugman P. The Move toward Free Trade Zones [J]. Economic Review ,1991 ,76(6) : 5.

[44]颜银根,安虎森. 演化经济地理: 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05) : 788 - 796.

[45]Baldwin R ,Forslid R ,Martin P , et 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6]Baldwin R E ,Venables A J.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5 ,3: 1597 - 1644.

[47]Puga D ,Venables A J.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3(3) : 347 - 368.

[48]Puga D ,Venables A J.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2) : 221 - 249.

[49]Martin P ,Rogers C A.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3) : 335 - 351.

[50]Coulibaly 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persistent uneven spread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areas [J]. Economie internationale ,2006 ,(2) : 5 - 23.

[51]Kikuchi T. Footloose capital and the locational

advantage of a hub [J]. Economics Bulletin ,2008 ,6 (43) : 1 - 9.

[52]邓炜. 轮轴 - 幅条型自由贸易协定的产业区位效应——基于流动资本模型的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 ,(2) : 42 - 48.

[53]陈丽丽,余川. 区域贸易协定如何影响 fdi 选择——基于三国自由资本模型的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 ,(07) : 75 - 80 + 89.

[54]Baldwin R E.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J]. China ,Asia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 ,2003: 51.

[55]鲁晓东,李荣林. 区域经济一体化、Fdi 与国际生产转移: 一个自由资本模型 [J]. 经济学(季刊) , 2009 ,(04) : 1475 - 1496.

[56]Robert - Nicoud F. A simple geography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nd capital mobility [J]. LSE , mimeo ,2002.

[57]Christiansen O. Industry relocation ,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across the Baltic sea: extending the footloose capital model [J].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s , 2010 ,(1) : 61 - 78.

[58]Boonyanate C.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 taxation , and industry location [D]. University of Dundee ,2013.

[59]Volpe Martincus C. Do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iscal competition help to explain location patterns? [R]. ZEI working paper ,2004.

[60]Tayebi S K ,Hortamani A. The impact of trade integration on FDI flows: evidence from the EU and ASEAN + 3 [J].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the Ag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2007: 277.

[61]Escobar Gamboa O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determinants and spatial spillovers across Mexico's states [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3 ,22(7) : 993 - 1012.

[62]An L Y.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 -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balance effect [J].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Review ,2013 ,2(2) : 79 - 91.

[63]Wang Z - a ,Chen X. Study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China - ASEAN free trade are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 its Applications ,2013 ,7(6) : 408 - 417.

(编辑校对: 韦群跃 陈崇仁)